

钟楼街史话之

千年街史略钩沉 14 钟楼街沿革及钟楼之殇(上)

王继祖 王 琛

钟楼街上故事多,而事关“钟楼”的故事最多。这些钟楼的故事,不是过往的街谈巷议和水分参半的“戏说”“话说”,而是真实的史事。这里我们遵循太史公司马迁的教诲,“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而世传,非所谓作也。”

钟楼街沿革

按理说,潘美新建的太原城中一定是有钟楼的,这无需引述什么史载、史述,古代佛家寺庙的建筑规制,更可无声地确定这个史实。因为太原宋建之城,城中不止一两家寺院,而最为著名的寿宁寺就建在东门正街的寿宁坊中。东门正街又是四条“丁字官街”之一,其街上的寺院、寺院中的钟楼,都应该是此街甚而至于整个太原城的地标性建筑。然而为什么当时就没有给这条街以这些地标建筑为名,命名为寿宁坊街、寿宁寺街或钟楼街呢?这似乎有悖于街巷命名的常理。

但是,追寻我国历史上城邑建筑的沿革与传承、转化,便可以知道,宋之前,再加上宋代之初,城邑建筑沿袭隋唐,为坊间规制。宋代中叶之后,经济科技发展迅速,打破了坊间传承,逐渐形成新的街巷格局。府邑、州城中的通衢大道,仍沿习宋之前的积习称之为“正街”“官街”,而在国都、陪都还存在着汉唐以来的“御街”之称。是时之国都、陪都之御街由于城市的发展,虽然打破了皇家、朝臣、大吏专用城中坊地的规制,但其主要街道之街名,仍保持和传承着以“四方之神”命名、以其街上“地标性建筑”命名的特权,非国都、陪都则不能也不敢僭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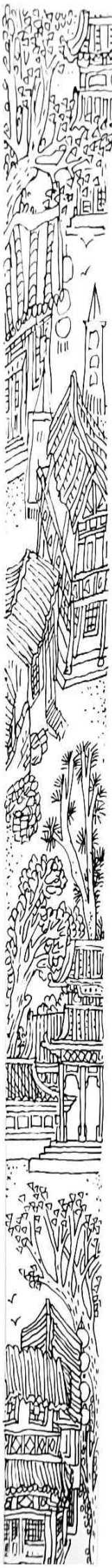
《宋史·地理志》和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》中说得明白,宋代的“州级建置”,分为13个等级,即“铺、雄、望、紧、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”。宋初潘美新建之并州太原城,降至“州级中的中低等级“紧级州”,怎能与唐代北都太原府、北汉国都并州太原同日而语?所以,城中之官街,只能由各自通往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城门之方位而名。有鉴于此,东门正街虽是城中官街,又怎能僭越规制,叫什么“寿宁寺街”“钟楼街”呢?

直到明初,谢成扩建太原城之前,历经宋、金、元三代数百年风雨剥蚀和战火陶冶之太原城,才从破旧残颓的苍颜中脱颖而出。一直沿用了数百年的“东门正街”,终于因与明太原扩城同时创建的钟楼落脚于街西之北侧,成为此街最宏伟的地标性建筑,而得新名“钟楼街”。当是之时,尚存香火的寿宁寺及寺内之钟楼,也可能由于寿宁寺改建和重修,已从原寺山门之右位变成后位了。所谓“永乐九年新建钟楼”之说,无论有无,实物无存,遗址无寻,史籍、志乘无载,只能当作街谈巷议了。

明初以来的钟楼街,在以后六百余年的沿革与演变中,街名虽始终未变,但街畔之钟楼、街道之盈缩、街名之增变、街区之重划却多经变故。其中,较大的变故就是寿宁坊完全消失了,那条坊中的南北向坊街变成了“帽儿巷”。寿宁寺经过“打钟寺”阶段,“打钟寺”又嬗变为“大中市场”,寺庙建筑几乎无存,其寺中钟楼不仅无存,连遗址也踪迹难觅。至于钟楼街,明清数百年间,最初,西起“西四牌楼”之“尧天”“舜日”坊,即今钟楼街西口,东至宋桥头故址,即今桥头街西口,后来在明万历年之后又先后街分三段,西段帽儿巷南口之西,因万历年钟楼拆迁,变为羊市街之东畔,析出“东羊市”街名;中段因“察院”于万历年迁来,析出从帽儿巷南口之东到老鼠窟,得名“察院前街”“察院街”;而老鼠窟之东,因明初建钟楼拆去,钟楼迁址新建于泰山庙对面,仍留用旧名“钟楼街”。这样,明初的钟楼街到明万历中叶后一截为三,从西至东依次为“东羊市街”“察院前街”“钟楼街”。

清沿袭明的官制,但裁撤其“监察”体制,驻太原的“御史察院”衙门不复存在,康熙年间“山西省提刑按察使司”衙门由西羊市之旧址(今太原财政金融学校,原太原八中)迁入裁掉的明察院。于是察院前街更名为“按察司前街”“按察司街”,约定俗成简化为“按司街”。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8年。是年7月1日,太原市人民委员会(市政府前身)颁令,将东羊市、按司街并入钟楼街。至此,三街又并为一街,钟楼街的起止点又基本恢复了明万历年之前的街况。

钟楼街之沿革,实际上是钟楼街名的沿革,因其街名、街长在旋转了一个六百余年的圈后,街两侧虽早是面目全非,而街之名谓、街之长短、街之宽窄几乎恢复和维持了“原装”,这一点也是成都之“宽窄巷子”、福州之“三坊七巷”无法比拟、难于同日而语的。



钟楼街街名沿革虽然精彩纷呈,多变之后又九九归一,恢复到最初,但是,最大之变故非“钟楼之殇”莫属。所谓“钟楼之殇”,有大钟楼之殇,亦有小钟楼之殇,而且并非一次、二次,而是三次之殇。

让我们先从小钟楼之殇说起。

钟楼街上关于钟楼的故事最多。当年,宋太原城初建,城中子城有谯楼,在子城南门“河东军”西侧,傍临子城南城墙。依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》载,此谯楼在“司录厅”西,“揀马厅”东,“右狱”



打钟寺小钟楼之殇

南,南城墙边。而城之钟楼在什么地方,没有查到。到金代,曾对城中最大之寺院寿宁寺进行了重建,之后寿宁寺产生了“打钟寺”之俗称,而且到了元末明初时,“打钟寺”之名已是太原城中尽人皆知。因为什么?因为寿宁寺之打钟之声年长日久,天天闻之,其声已成为太原城民劳作、歇息、往来、行事的一种无形的依托。“打钟寺”之俗称,正是在这种长期的生活氛围中,闻其寺“打钟”而行之的一种形象之称。然而,在明代洪武初扩城之时,新的大钟楼问世了,钟声的声闻四达,取代了

“打钟寺”钟楼、钟声的存在价值,至此,“打钟寺”之钟声、钟楼,退出太原城民的生活,小钟楼也不知在何时消失,无声地殒逝了。何谓之“殇”?有三释,一指“未至成年而死”,一谓“非正常而亡”,一乃“为战争而死”。原寿宁寺、后来的打钟寺之钟楼,因明大钟楼的问世而失去了在城民生活中存在的价值,不久寺院衰颓,僧侣四散,又失去了在寺院中的价值,无人问津,日见颓败,终于非正常地消逝了,它的消逝,不是寿终正寝,而是夭折,故而称为“殇”。

谢成建洪武初大钟楼之殇

谢成扩建太原城,同时创建了可以与鼓楼和八座大城门楼媲美的钟楼。这座钟楼是什么模样,史无载,人无述,已无法得知。但是,它是天折,意外地遗下一篇傅霖所作的《重建钟楼说》(下简称《说》)。傅霖《说》文所述明洪武初大钟楼之殇语焉不详,仿佛是一座“寻常看不见”之“峥嵘”的山峰,成为千古之谜,这里我们尝试着探索一二。

明洪武初,永平侯、晋王府相谢成所建之大钟楼“屹屹岩岩”,挺拔高大,威武庄严。悠悠二百载后的万历年间,与钟楼同期所建的鼓楼巍巍如故,傲视全城。钟楼也与鼓楼一样并无毁损,但却不知何故,引得议论纷纷。

万历皇帝在明史上号称“中兴之主”,万历之朝,亦列为“中兴之朝”。但是,在山西省的“通志”、太原府的“府志”、阳曲县的“县志”上,却异“志”同“声”地记载着万历朝时太原府出现的许多不祥之兆。先是,在弘治年间,“省城谯钟,数百年物也。相传弘治间,钟夫他往,其妻卧蓐未久,代击之,遂裂”,率先引出钟楼的不祥前兆。继而,“万历六年,彗星见晋,大风摧折镇朔门迤东第三座城楼一座”。再后,“万历八年,省城察院焚(火灾),后改于太子府。”之后,便是“岁在庚辰(万历八年),钟师撤,故钟楼抑而卑之。”再之后,“四三年末,疫病大作,饥馑洊臻,上自王子侯,下逮氓隶,愁苦叹息,声相属也。”再之后,省城太原“岌岌皇皇,哀死扶伤,欲叩帝间,不知其方”。省城之内瘟疫肆虐,流言四起,种种不祥笼罩着大钟楼,人心惶惶,不可终日。

这个只有“天晓得”的“罪过”似乎落在了钟楼的身上。上面所录诸部志书的诸条史料,仅是部分选摘。但这些史料,从省城太原钟楼之钟的“遂裂”,到“彗星见晋”;从省城“察院之焚”,到钟楼“钟师之撤”;本来高大宏伟的钟楼被蔑视为“抑而卑之”;最终是被拆掉,“断而小之”迁建于“泰山庙”对面,规制大不如前。这些变异的本因,从本质上讲本与钟楼毫无干涉,但省城的“疫病大作,饥馑洊臻”总得找出些缘由

吧;“岌岌皇皇,哀死扶伤”总得给些慰藉吧;找缘由,给慰藉,总得事出有因吧。于是,一番忙碌开始了:询于堪輿家,询于阴阳家,询于宿儒家。诸询不得要领后,再找父母官。先请示郡(府)县之官,再找省级“藩臬”之官,再找专管巡视地方、专处政事的“直指使者”,一直找到“御史钦差”……最后谁也不问了,谁也不找了。理由洞若观火:钟之裂、察院之火、彗星见晋,都是上天示警;疫病大作,饥馑洊臻,就是上天示警之后给予的严厉惩罚。虽没有明示,却隐喻着暗示,似乎只有拆掉钟楼,移址重建,才是最好的禳灾免疫之法。

万历之年的拆除明初所建大钟楼目的只是一个,推掉官家治理无方的责任,欺骗百姓,愚弄民情,导向一个替罪羊的明示或暗示,即所谓的“上天示警”所指。这样,在求乞了诸方高人甚至衙府后,最终以钟楼替罪被拆掉,迁址重建告终。或曰,拆掉就可以了,何需重建?这也想得有些太简单了。拆掉拉倒,难道是钟楼当初就不该建?岂不有辱皇家既定建城之规矩。最好的办法便是明里什么也不说,只是将钟楼拆去,“移址重建”,既可达到尊崇上天之警示又可安抚不安之民,还不耽误日后之城中有钟楼,官民按时行事。

依傅霖《说》文,印证了志乘所载,万历六年戊寅,彗星见晋,省城北城垣镇朔门东第三座城楼被毁;万历八年庚辰,省城察院火灾,后迁之于太子府;同年,便把钟楼的钟师裁减了,钟楼的声誉也让人大跌眼镜,“抑而卑之”。之后三四年间,太原城中疫病起、饥馑现,陈年不止,求天天不应,呼地地不灵,求遍堪輿之家、阴阳之师,还是毫无起色,禳祈实沉、台骀等地方山川之神,也是泥牛入海。一直到了万历十一年癸未,仍是灾瘟不息。

眼见得三四年过去,城民百姓祷告无方,晋绅官员束手无策,也不知最后怎么就确定拆掉钟楼,徙址重建。于是乎主事的官员出现了,具体操办的官员也确定了,动工的日子定下来了,于是乎,一座伟岸的明初大钟楼被拆

掉了,一座“断而小之”的、崭新的万历钟楼,在东面距大钟楼原址数百米的钟楼街中段南侧、泰山庙对面、临街之地问世。明初创建的大钟楼无疾而夭,真可谓大钟楼之殇。这也是钟楼街上第二座、第二次钟楼之殇。

这一年是万历哪一年,史志无载,傅霖《说》文,只记“经始于某年某季,迄工于某年某季”;“以某官某董其事,而以某官某某官分任焉。”如此含混之记,如此神秘之说,这可不应是傅霖这个敢说敢为、耿介坦诚之人的所作所为。好在地方志乘所记:“省城察院焚,后改于太子府;钟楼移于泰山庙前”,从侧面告诉我们,察院迁于太子府,与钟楼移建于泰山庙前,似乎在同一个时间段,具体时间相距不会太远。傅霖《说》文,虽多方为钟楼主建者、实施者以“某某”掩饰,开工期、竣工期语焉不详,有意含混,但是文中两个年记“庚辰”“癸未”,也从侧面告诉后人,察院失火之年,钟师被裁,察院失火之后四年,钟楼还未起建,无疑是在万历十一、十二年前后不久。

明初创建的规模甚巨、挺拔高大、巍巍庄严的“屹屹岩岩”的钟楼就这样“殇”逝了。迅速建起的新钟楼似乎就取材于被拆的旧钟楼。否则材料来之于何处?费用何方承担?这些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。对新建之钟楼,傅霖《说》文十个字一代而过,“屹屹岩岩,尽复畴昔之旧”。果真如是说吗?非也!《说》文之说在这里打了埋伏,康熙《阳曲县志》字字凿凿:“钟楼,旧建寿宁寺(西),后因察院回禄(火灾),改移泰山庙前,规制若城(楼)小,楼匾曰‘晁氏洪声’。”其中之“规制若城小”几个字,道出万历年移址重建之钟楼不及原钟楼之高大雄宏,规制要小得多。

雄美俏丽、保持有元末明初建筑规制的洪武年大钟楼,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殒逝了,个中隐藏着难为后人所知的千古之谜。明初大钟楼之殇,是钟楼街上又一个让人难以放下又难于弄清的千古之谜。

本版绘图:王斌礼